

# 浙江乡镇村志编修的历程、 特点与价值述论（1949—2018）\*

张 勤

**提 要：**浙江乡镇村志的编修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延续性强，而且质量上乘、价值可观，历来居于全国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委、政府、方志部门、学者及乡民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乡镇村志的编修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与体量蔚为大观，总体质量颇佳，在编修出版、体例内容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并展现出丰富的文献价值、社会价值和文本价值。

**关键词：**浙江 乡镇村志 新方志 编修 编纂学

浙江素称“方志之乡”，地方志编纂具有悠久的历史，始自宋代的乡镇志（含乡、镇、村、里等志）编纂也有着优良的传统。现存最早乡镇志常棠《澉水志》（1257年刊布）就产生于浙江海盐。明清时期随着乡镇经济的发展和人文教化的繁盛，乡镇志作为府县志的基础被大量编修，民国时期编修的乡镇志也为数不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首轮修志的大规模开展，以及乡镇经济的迅速发展，乡镇志编修开始进入兴旺期。首轮修志中，浙江省是全国出版乡镇志最多的省份。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民众历史文化意识的不断增强，乡镇村志书（以下简称镇村志）的编修发展迅速、方兴未艾。

浙江乡镇志的编修不仅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延续性强，而且质量上乘、价值可观，历来居于全国前列，备受瞩目与称道。对于浙江乡镇志，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以之为研究的基础和史料资源，进行关于各时期江南市镇经济、人文以及基层社会等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多利用包括浙江乡镇志在内的地方文献，成果数量众多、积淀深厚。此外，学术界对浙江乡镇志文献本体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学方面的查考著录与整理成果，对浙江乡镇志进行查考著录、编纂提要与汇编整理，二是从史学史的角度对乡镇志进行研究，三是相关史学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跨学科的综合考察以及从编纂学角度进行的分析探索。在后两类研究中，浙江乡镇志被置于乡镇志的整体框架内，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同时，学术界目前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对乡镇志的史料价值、所体现社会职能等问题的研究。

以往研究多以乡镇旧志为资料或对象，关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镇新志的研究则相对较少。<sup>①</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修的浙江镇村志数量与体量蔚为大观，涉及的人力物力颇为可观，但截至目前，浙江镇村志编修的总体状况尚不明确，志书的整体质量与编修效果不甚明晰，志书编纂与乡村发展和乡村研究之间的关系亦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存在很多需要厘清的问题。因

\* 本文系2018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浙江乡镇志考录提要与整理研究”（18NDJC244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19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浙江村志编修研究”（2019CYB20）的研究成果。

① 在浙江省以外，已有部分省市地方志工作机构通过对当地新中国成立后的镇村志编修展开调研，并形成调查报告，如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上海市乡镇街道村志编修调查》、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地区村志的编修》等。

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已定并大力开展,在镇村志编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的今天,对新修镇村志的编修状况及其特点价值作出适当的回顾总结和探索研究,不论是对浙江镇村志编修本身,还是对乡村的建设与发展,都是必要的。

## 一 编修历程

在历史的长河中,浙江乡镇志的编修成逐步递增的发展趋势,宋→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呈现阶梯递增模式。根据相关研究成果<sup>①</sup>,我们统计出浙江乡镇志书各时期的数量分别为:宋代4种,存1种;明代27种,存7种;清代127种,存71种。另据全省地方志系统、图书馆系统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统计<sup>②</sup>,浙江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8年间,共编修镇村志约700种,其中乡、镇、街道志约300种,村志约400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镇村志编修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是第一阶段,那时镇村志编修为数不多,且多未公开刊出;1966—1976年之间,有较长一段空白期。改革开放以后是第二阶段,伴随新方志首轮修志的大规模开展,镇村志编修开始步入兴旺期;进入21世纪后,镇村志编修保持发展态势并在近年加速发展。

###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镇村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方志编纂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全国许多省、市、县纷纷抽调人力、设立机构,积极开展新方志编纂,掀起了社会主义第一次修志热潮。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1967年以前编出全国大部分县市(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的地方志”的规划并没有持续贯彻下去,新方志编纂也陷入停滞状态。<sup>③</sup>据现有确切资料,这一时期浙江省有8个市县启动新方志编纂,编成2部新方志初稿,没有正式出版新方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镇村志更是较少编修,以私人修撰为多,多以稿本形式存在,较少刊印。因存世少且散失多,这一时期的乡镇志数量尚无统计。浙江现存仅见4部,均系未刊本,其中2部私修,依成志时间先后分别为丽水的《锦溪乡志》(1957),嘉兴的《嘉兴县惠民人民公社社志》(1959),湖州的《“双—”简志》(1961)、《南浔小志》(1966)。

丽水龙泉林福生所纂《锦溪乡志》成稿于1957年7月,系横排竖写本,有69页,1万余字。此志实承民国修志之余绪。张和孚编《南浔小志》,1966年未刊稿本,共2册4卷。此志在周子美所赠《南浔镇志稿》基础上纂辑,上限1912年,下限1948年。《嘉兴县惠民人民公社社志》,1959年4月编印,16开油印本,共5章,约4.4万字,文字叙述很少,也无体例可言。严格意义上讲,这部所谓社志,更像是一本档案资料汇编。湖州安吉县《“双—”简志》是一部村志,由中共安吉县递铺公社双一生产队支部、安吉县档案馆合编,1961年1月印行,38页,简装32开本,篇目的名称、内容的安排、文字的表述,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虽然现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乡镇志数量很少,但类型丰富(有乡志、镇志、社志、村志),篇目、体例、内容也不相类似(《锦溪乡志》多依旧志写法,《南浔小志》则兼有民国之风,另两部志书时代烙印深刻),修志的主体亦不相同(既有私纂,也有公社、村组织编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① 参见陈凯著《清代乡镇志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等考证成果。

② 如《湖州方志提要》(沈慧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衢州方志提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方志出版社,2017年)、《台州方志提要》(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传承·前行——宁波市地方志发展纪略》(宁波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宁波出版社,2014年)等。

③ 王张强:《浅述1956—1966年中国新方志的编纂规划、模式及程序》,《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1期。

反映出这一时期浙江镇村志编纂的多样性，呈现出总体上不活跃但也并不沉寂的状况。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镇村志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编修，无论从志书的内容、修志的规模，还是参与的人数来说，都远远超过往昔。当时全国已出版的30部新编镇村志，多集中于南方，特别是江浙地区。首轮修志中，浙江省已是全国出版镇村志最多的省份，据1992年不完全统计，已出版新编镇志68种、村志46种，镇（乡）志、村志成为浙江新志的两大系列。<sup>①</sup>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经济迅速发展，在浙江经济呈现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镇村志的编纂则与之交相辉映。浙江省将镇村志的编修、出版纳入浙江省名镇志集成、浙江省名村志集成与浙江乡村社会研究系列丛刊。至1999年，浙江省出版新编镇（乡）志69种<sup>②</sup>，仍为全国出版乡镇志最多的省份。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延伸<sup>③</sup>，镇村志的编修发展迅速。从2015年起，为助力全国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持续实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全国的乡镇志、村志编修更是高潮迭起。仅2018年，全国年内出版乡镇志、村志330多部。<sup>④</sup>截至2018年年底，浙江累计出版乡镇街道志和村志共约700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镇村志的编修数量超过此前的编修总和。

乡镇志与府、县志不同，自宋至民国，浙江镇志修纂的分布状况极不平衡，大多分布在当时富饶的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平原。有的镇还一修再修，连绵不断。如明、清、民国间曾14次编修濮院镇志、11次编修双林镇志。虽然镇志的编纂范围在不断扩张，但是总体而言，浙江其他地区的镇志修得很少，历数百载而付之阙如的绝非少数。<sup>⑤</sup>镇村新志的编修不再如乡镇旧志编修那样限于部分经济发达乡镇，各市都开展了或多或少的编修活动，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很多市县出现了从少到多的趋势。镇村志的编修虽然有了扩散性的发展，但从地域分布看，各市所修镇村志数量差距较大，各市内部覆盖面也大小不均，有的县区已实现“镇镇修志”，有的正在启动编修，有的尚处于空白之中，地域差异仍存在。11个地级市中，温州、嘉兴、杭州的乡镇志数量位居前三，金华、绍兴、杭州、宁波的村志数量居于前列，其中金华市的村志数量<sup>⑥</sup>占全省村志总数近40%。

不过，相比于乡镇村的数量，镇村志的覆盖率并不算高。据1985—2019年历年《浙江统计年鉴》数据统计，浙江省的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历年的平均数分别约为1600个和35000个。若以1985—2018年间浙江全省编修乡镇志300部、村志400部来计算，乡镇志数量与乡镇数量之比接近20%，村志数量与村民委员会数量之比接近1.2%。<sup>⑦</sup>其中，虽然村志的统计当远远小于实际数<sup>⑧</sup>，正在编纂的村志数量亦是不少，但从现有数据看来，与村庄总数相比，已出版村志

① 参见邱新立：《中国新编地方志二十年成就（二）》，《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3期。

② 参见周祝伟：《浙江新编地方志目录》，方志出版社，1999年增订本。

③ 参见李培林：“修志工作要往社区、乡镇和村延伸”，《在江苏省调研地方志工作时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6期。

④ 参见冀祥瑞：《坚定信心，凝心聚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志”礼——2019年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工作会议工作报告》，《黑龙江史志》2018年第12期。

⑤ 参见魏桥主编：《浙江省名镇志·前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 村志中有谱借志名者，与严格意义上的村志有一定差距，这种现象在金华市较为突出。

⑦ 乡镇村志数量与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数量的比例，因存在两者统计口径不统一的问题，难以精确计算，故只取相关数据的约略数，用于表示大致比例。

⑧ 参见孙达人：《中国农民史的价值和意义——兼论族谱、村志的社会功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的仍是凤毛麟角。当然,随着乡镇村数量的减少<sup>①</sup>与镇村志编修的增加,镇村志与乡镇村数量之比均在逐步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

1949—2018年浙江省各市镇村志数量表

志数/市别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合计
镇乡街道志数	43	31	59	56	29	29	13	18	9	13	10	310
村志数	53	47	18	5	6	58	147	18	7	11	24	394
总计	96	78	77	61	35	87	160	36	16	24	34	704

1. 资料来源:浙江图书馆及各市县图书馆馆藏志书;各市县方志办提供的志书与材料;志书作者和收藏者提供的志书与材料

2. 说明:以村志命名者多予收录;村史均未记入;因搜集渠道有限、统计截止时间(2018年)与今时接近,应有部分已出志书未能收录

## 二 编修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浙江镇村新志编修,与浙江的乡镇旧志一样,也有着起步早、起点高的优势。建国以来的浙江镇村志编修仍然居于全国前列,并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创造了许多“先例”。<sup>②</sup>具体而言,浙江镇村新志的编修经历了形式、内容上的巨大变化,在编修出版、体例内容、组织方式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点。

### (一) 连绵不绝,编修出版呈现旺盛生命力

1. 编修延续性强,修志续志渐成常态。正是在多方协力的基础上,浙江乡镇志编修自1982年起,村志编修自1987年起,再未中断,总体平稳,每年都有一定数量问世,并且随时间推移,数量有所增加,展现出很强的延续性与生命力。其中,全省乡镇街道志(含《浙江省名镇志》与《浙江省名村志》),20世纪80年代有28部,1990—1999年有79部,2000—2009年有74部,2010—2018年有130部;10部(含10部)以上的13个年份中,有7个出现在2010年以后,2017年达到一个小高峰,有27部乡镇志问世。村志的编修,20世纪80年代有12部,1990—1999年有76部,2000—2009年有148部,2010—2018年有157部;且自1996年起,每年都在10部以上,再未少于此数;2003年、2014年、2015年均在此数以上。

镇村新志中,既有纵贯古今的通志,也有接续前志的续志,其中通志占主体地位,这既是传统使然,更因为多数乡镇村还是首次修志。间隔时间较短又连续修志的乡镇,以某个时段为时限编修续志,这种情况虽在少数,却逐渐增多。参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每20年左右修一

① 如1985年、1992年、2018年的浙江省乡镇政府分别为3240个、1844个、908个;村民委员会分别为43307个、43516个、24711个。

② 早在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学实习队的师生们就在温州大桥镇开展了镇志编纂;许亦江主编的天台《水南村志》(2003)是中国较早由村民个人修撰、公开发行的村志;毛东武、毛兆丰两度主编的《白沙村志》(1991、2012),是中国较早以村为单位单独出版的村志与续志,得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赵洪祝的关注;魏桥主编的《浙江省名镇志》(1991)、《浙江省名村志》(1994)分别记述161个建制镇、604个行政村的历史和现状,是乡镇志编纂的一种特殊形式,等等。

次志的规定，在经济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电子图书兴起、纸质图书保存条件日益改进的条件下，编修续志也可能逐渐会成为乡镇村修志的“新常态”。

2. 出版形式多样，公开精装电子化占据主流。就出版形式而言，乡镇志由油印稿到内部出版，再到正式出版，乃至兼出电子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80年代早期，有不少油印手写稿本。之后志书有公开出版的，也有非公开出版或印刷的，公开出版日益增多。在装帧方面，也表现为由简本到精装本，32开本到16开本的发展趋势。曾经流行于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32开精装本，自90年代后期起已很少见到。印数方面，私纂的印数较少，以致于有些志书现已难见到原本，只留存复印本。此外，自2007年《采荷街道志》采用全彩印后，有10余本乡镇街道志采用了高成本的全彩印刷，正文中的彩图、彩色照片配合文字，观感更佳，存史价值也更高。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阅读与获取信息的方式不断改变，许多乡镇志不再只印刷纸制本，也制作了电子本发行，随书附赠光盘，甚至上传至网站，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读志用志方式。如浙江地方志网站的数字方志馆有《浙江省名镇志》《浙江省名村志》可读，杭州数字方志馆有10余部乡镇志电子资源上传供阅读，舟山网上方志馆上传所有本市已出镇村志电子资源，并可直接下载。

3. 修志领域拓展，旧志整理等成果迭出。从乡镇志的修志领域而言，已从单一的编修新志，进一步拓展到对原有旧志的整理。如湖州新市镇自古以来多次修志，从明正德十一年（1516）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约400年间有《仙潭志》《仙潭后志》《新市镇续志》《新市镇再续志》，另《仙潭文献》，共有5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1988年的《新市镇新志》与2009年的《新市镇新志》先后出版。新志出版时，新市镇旧志被一起重新装订印刷，成为《新市镇志集成》系列。

又如清道光《渔闲小志》，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浙江方志考》诸多目录提要书中皆未著录，且国内外其他图书馆皆未有别本收藏，实为清代孤本乡镇志书。2000年，嘉兴市地方学者俞国林等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所藏志书稿本进行抄录，并加以影印复制，该志方得重回故里。2008年，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委会，推出了由吴上德、杨耀祖等人整理的道光《渔闲小志》校点注释本（暨画册一本），发行1000册。后来该志原稿影印本收入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续编》第四册。

他如台州市方志办影印了民国《路桥志略》、慈溪市方志办出版了王清毅与岑华潮的《余姚六仓志》标点本、上虞市方志办出版了夏军波校续的民国《松夏志》，等等。旧志整理工作在乡镇志领域得到了更多关注，出现了更多的成果。然而浙江乡镇旧志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仍付诸阙如，这是今后方志文献学研究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对象。

此外，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桐乡）《乌镇志》（方志出版社，2017）中文版出版后，英文版也随之问世。《乌镇志》（英文版）是海内外第一本英文版志书，涵盖《乌镇志》中文版除“翰墨清芬”篇目中古诗词等传统文学作品之外的所有内容。2017年12月3日，《乌镇志》中、英文版亮相世界互联网大会，并作为特别礼物赠送给与会重要嘉宾，开志书助力国家重大国际会议的先例。

## （二）编纂得法，志书质量呈现整体优势

1. 体例体裁更趋完善。乡镇旧志的私纂性质使之带有浓厚的私家著述色彩，新编乡镇志较旧乡镇志，其非区划性、私纂性的特点逐渐地消逝，与省、市、县（区）志一样，具有区划性和官修性。乡镇已成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行政政区，其行政区划十分明确，新编乡镇志的记述地域范围也以本辖区为限，不再“越境而书”。以官修居多的乡镇新志，在体例、篇目设计上减少了随意性，体例结构更接近县志，更为整齐划一。多数志书采用章节体，前置概述、大事记，后有附录、跋、编纂始末，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来记述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套用市、县级志书的框架结构、篇目设置的情况，对于志书内容

的完整性有一定助益,当然,若大量出现,也会产生面目单一,微观资料缺失等问题。

在笔者统计的约300部乡镇街道新志中,有90%以上设有大事记;约80%设有概述和凡例、设置人物等常规章节、收录照片和地图、采用表格;约70%设有后记;约50%设有丛录或附录。可见诸体并用,体例更加完善,体裁更加完整。

相比而言,村志的编修,因村与行政建置的距离略远,编修内容较多体现出以本地村民为主体。私人纂修也使志书体例内容呈现出更为多样、不拘一格的面貌,有的志谱结合,如永康《连枝村谱志》,有的自创新体,如江山《六家志》,有的则随意不羁,内容更是繁简悬殊。有些村志将志与谱作了很好的结合,如永康的《河头村志》。21世纪以来,随着村两委更多地介入修志,政府主导模式渐占主体,村志体例也出现了一种向县志看齐的趋势。

2. 内容体量颇为可观。21世纪以来的大部分镇村志的内容涵盖面广,凡涉及区域内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内容均有收录。各志所设篇目的规模、数量不同,但其构成大都涉及自然环境、镇村建制、姓氏人口、土地、交通、商业、农业、工业、财税金融、镇村建设、党派群团、基层政权组织、军事治安司法、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广播电视名胜、社会生活、方言、人物、丛录等。架构的完整程度、内容的丰富程度,与县志相比毫不逊色。

要承载这么多内容,镇村志的单本规模和体量必然大幅增加,文字量由数万字向数百万字扩张。21世纪以来,100万字以上的镇村志已屡见不鲜。<sup>①</sup>目前所见篇幅最大的是2017年出版的金华浦江《黄宅镇志》,共5册,327.6万字。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新修镇村志合并计算,约有数亿字的篇幅。

3. 镇村特色得到提炼。乡镇虽小,却往往因其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特殊原因,而形成自身特色,能把这些特色归纳提炼,正是志书最具使用价值所在。所以镇村志编纂者在提炼特色上不遗余力,努力突出地方特色,讲好地方故事。

虽然体例向县志的趋同会削弱乡镇志的地方特色,然而,由于乡镇村新志的记述层次较低,内容较为丰富,涵盖的范围较广,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内容往往会以升格、详记的方式加以突出,因此使志书仍能保持一定的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如海盐县《澉浦镇志》,其中旨在反映地方特色的卷、章就达到了一半篇幅。因我国唯一集山、海、湖于一体的风景区——南北湖坐落在澉浦镇,故该志特设“南北湖风景区”1卷,浓墨重彩地记述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又因澉浦镇靠海,古代为著名的“海防要津”“海塘重镇”“贸易良港”和“产盐重地”,故在卷二设置了“海塘”“盐业”两章,彰显澉浦的地方特色。<sup>②</sup>王志邦主编的《浦联村志》,突破传统编纂模式,因地制宜,设置篇目,突出重点,反映特色,开拓了浙江村志编纂的新模式。该志获得第八届(1995—1996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劳乃强主编的《龙游沐尘乡志》在专题篇设置了5个专题,即红色足迹、畚乡风情、余绍宋在沐尘、沐尘水库和诗文选辑,每个专题相当于一个分志,分别记述沐尘畚族乡的重要特色。如此结构,在体例设置上为记叙该乡的特色内容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使之得以详细记载,充分展现。他如《小营巷街道志》,对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小营巷卫生工作作了专门记述;2015年版《双林镇志》因双林是绫绢古镇将“蚕丝 绫绢 丝绸”升格为编,等等,都使镇村志的特色得到了提升。

<sup>①</sup> 如杭州市,1980—2000年间出版的10余部乡镇志均为数十万字,篇幅最大的《桐庐镇志》66万字,而之后出版的约有10部超百万字;又如湖州市1980年成稿的《菱湖新志》约10万字,2009年出版的《菱湖镇志》有240万字。

<sup>②</sup> 参见沈松平:《关于当代乡镇志编修的思考》,《广西地方志》2016年第5期。

4. 编纂方法更为扎实。浙江镇村志的编修者有着可贵的求真、探索精神，在社会调查、资料考证方面不遗余力。早如1957年成稿的丽水龙泉《锦溪乡志》，其纂者林福生曾于1944年被派为浙江修志馆龙泉西乡一带的采访员。林在《锦溪乡志·新编锦溪乡志起略》（即林福生自序）中称，他在采访时是对应着县志体例，“摘要遵依省府颁定各县修志事例概要”，“以广多采，不厌求详”。后编乡志时，“对凡在本乡之名胜及历代沿革以来照依县志科目所举，便如古时风俗、科学、祠庙等等所见所闻，汇集锦溪纲纪一册”。因此，该志对乡情考查颇为细致，搜罗颇广，资料来源颇丰，于府志、县志、山水志、家谱、童话、传说都有采用。近如2018年出版的《温州瓯海区南白象街道志》，随文配置了129张表格，在涵盖事物各个方面的同时，化繁为简，文约事丰，集中表现了事物数量和动态变化的状况，较好地发挥了志书表体的功能，增强了志书资料的容量和使用价值。难得的是，大量表格下方标注有“资料来源于实地调查”“数据来源于民间调查”字样，说明是编纂者亲自采集的。

对于搜集到的各类资料是否入志，编纂者也有一定的考量。如1994年出版的《浦沿镇志》，其有关历史部分的叙述，是在查阅了大量的方志宗谱等历史文献资料后写作而成的，一般都详细的注明了资料来源，不仅注明了书名，而且注明了卷次和门类。其引用的资料都尽最大可能采用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某些没有明确结论的问题，《浦沿镇志》详细了前人所说，不匆忙作出结论。<sup>①</sup> 这样的做法，体现了志书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同时，镇村志的编纂吸取了传统方志和社会主义时期首轮修志实践的经验，编纂者在修志的步骤、方法上也越来越有章法。如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资料，不仅按惯例查阅报刊、档案、图书、县市志、旧志、家谱等资料，请相关镇村部门提供资料，还发布征集资料文告（如宁海《长街镇志》等）、征集私人收藏（如乐清《黄华镇志》等），走访村民或召开村民座谈会（如《岩大房村（社区）志》等），赴兄弟镇村学习交流；有的还采用三级志书编修中的初审、复审和终审（如建德《寿昌镇志》）等多个环节，听取意见，以期提高志书质量。

### （三）多方参与，共同推动镇村志发展

1. 政府重视修志，担当修志主体。与乡镇旧志相比，乡镇新志的编修，从编修主体看，政府修志取代了私人修纂已成主要趋势，方志工作机构介入指导更成为常态。从具体操作看，一般都由乡镇政府或党委、政府组成编纂委员会，负责指导、协调和保障等工作，下设编委办或临时的修志办，选定主编和副主编，具体负责修志业务工作。私纂而成的乡镇新志相对较少，并有减少的趋势。至2010年浙江湖州已成书的25部乡镇志书中，由政府作为主体承担修志的有13部，占52%。2018年全省出版的15部乡镇志，则100%由政府作为主体承担修志。

村志的编修略有不同，其编修多由县一级修志机构主导或村民自发的编修，编修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乡镇村，或者是城中村。但随着修志逐渐被纳入乡村文化建设的范畴以及方志机构的深度介入，由村委会出资、方志机构指导的修志模式也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只是不如乡镇志那样显著。

2. 民间基础深厚，学者乡民携手。深厚的史志编纂底蕴，悠久的乡镇志编修传统，发达的区域经济，良好的人文环境，使浙江民间的镇村修志基础十分坚实。镇村小志，它不仅记载历史，更凝聚着众多修志人多年的心血，热心文化、热爱乡土的乡民村民、学者专家等纷纷参与修志。

乡民修志。如湖州《南浔小志》（1966年稿本）的编者张和孚是南浔镇人，从事工厂会计等工作。嵊州《谷来镇简志》《横路坑村志》的编者马善军是一位在杭州工作的“80后”，谷来镇马村外横人，编有多种乡土书籍，并自费印制免费发给村民阅读；他热心乡里文化建设等事迹

<sup>①</sup> 参见李志庭：《浦沿镇志·序》，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

被多家媒体报道。景宁《大赤垟村简志》是由4位耄耋老人合力编写的，老人最大的86岁，最小的81岁……由当地人或近乡人编写镇村志的情况不胜枚举。虽然他们都是比较熟悉地情的乡人，但要写成志书，并不是单单靠查找些资料、凭借自己的经历和记忆就可以的，很多信息需要编纂者实地考察核实。除此之外，编纂者们还会开座谈会，听取镇里有阅历、有经历的老人家们的意见，广征博采。涉及到相关部门的，会请各部门审阅过手稿。几经修改，最终才定稿，送出版社出版。他们为修志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学者修志。如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龚剑锋1989年撰嵊州《开元镇简志》，虽然只有19页内文，约1.4万字，但文省意赅，内容精炼，所记事物特色鲜明，辑考较备。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担任杭州大学历史系古建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的俞日霞，编纂了《宁六村志》等数部绍兴村志。诸暨《枫桥史志》（1998）主编陈炳荣系枫桥镇人，抗日战争时曾就读国立西南联大，毕业于边务研究所，中国地理学会会员，有《诸暨县简志》等70余万字著作。此外还有很多方志工作者同时也是地方文史研究方面的学者，也积极地投身于镇村志的编修。更多的学者参与修志的方式，不是直接编纂，而是为之提供资料或意见，为之作序或题词，为之评论或宣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3. 方志部门介入，助推成效显著。从首轮修志始，浙江的方志部门就对镇村志的编修给予很大的关注。省方志办人员少，无法顾及乡镇志，于是采取支持修志但不作规定要求的态度，并创新了乡镇志的编修模式，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浙江省名镇志》和《浙江省名村志》的编纂。以此为起点和代表，全省先后编纂《东阳名村志》《湖州市名村志》《嘉善县乡镇志》《文成乡镇志》等集镇、集村型的镇村志。往往一卷在手，即可了解、研究浙江或相关市县城镇的现状、历史和各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编纂者的匠心独具，被收入志的名镇各呈异彩。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浙江省名镇志》和《浙江省名村志》书成之后的二三十年里，浙江的乡镇经济、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当时这些汇编在一起的名镇都纷纷单独修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更为细致地记录了乡村发展的历史脉络、成败得失。

1995年，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永康市河头村在永康联合召开中国乡村文化研讨会暨《河头村志》出版发行会议，探讨村志编纂模式。浙江这种农民自发地开展村志编修，被中国农民史学家称为“农民觉醒的一个标志”。这次会议对之后浙江村志的编修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2年发布的《浙江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是唯一将镇村志编纂正式列入部署的地方法规。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志、其他志书和年鉴的组织编纂、管理、开发利用工作，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其他志书和年鉴，是指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及个人组织编纂的专业志、乡镇志、村志和专业年鉴等资料性文献。”该办法对《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内容进行了延展，在地方志工作与镇村志编纂之间架起制度化桥梁。地方志部门介入程度越来越高，在其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市县志办则更为深入地介入到镇村志的编修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市县第二轮大规模修志的过程中，有些县（市）方志办主动将乡镇志编修纳入常规工作，大力推进，效果明显。如2007年嘉善县县委办县府办合发的《续修〈嘉善县志〉工作实施方案》中要求：“各镇、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续修或新修乡镇志与专业志（规划名单附后），有条件的镇要选择一个村编村志。”并附编修镇志规划11部（魏塘镇〈续修〉、西塘镇〈续修〉、干窑镇、大云镇、丁栅镇、

<sup>①</sup> 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十多位著名学者为数十部浙江镇村志作序题跋，如浙江大学陈桥驿、毛昭晰、孙达人、李志庭、金普森，南开大学来新夏，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复旦大学葛剑雄，上海交通大学黄良余，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李裕民，等等。



洪溪镇、姚庄镇、陶庄镇、惠民镇、天凝镇、杨庙镇)。截至2018年,这11部志书全部完成出版。柯桥区史志办则构筑区、镇、村三级修志体系,全域编修镇村志,抢救乡村记忆,先后牵头完成《钱清镇志》《兰亭镇志》《福全镇志》等14部镇志的编修,实现“镇镇有志”,其中《钱清镇志》入选首批“中国名镇志”。

同时,方志工作者亦在镇村志编修中施展专业之长,主持或参与大量志书的编纂。有的担任主编、副主编、总纂,有的担任顾问、评审,有的为志书写序,有的提供资料。如省方志办魏桥曾先后为十余部镇村志作序,永康市方志办应宝容担任十余部村志顾问。也有的以县志编纂的“原班人马”集体承担镇村志编修,如诸暨市地方志办公室抽调骨干成立编纂委员会,多方搜集整理资料,历时两年编成诸暨《岭北镇志》。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中指出,修志人员的素质决定着志书的质量,主编得人是一部志书成功的关键。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也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方志工作者将市县志编纂的方法和经验带入镇村志编纂,对镇村志的体例篇目、编纂方法等产生较大影响,为保证浙江镇村志的整体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sup>①</sup>

当然,镇村志的编修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资料审核不严,错误较多;有的以内容极简,空有志名;有的志书不定例规,随意安排各篇章及其上下限;有的缺乏基本史识,对传闻不加考证照搬入志,等等。各种问题造成志书的不严谨、不规范、质量难以保证,以至于不可信、不可用、价值难以发挥。同时,在编修出版方面也存在一些困局,或因重视不够,或因经费不足,或因人手缺乏,影响了编修和出版。此外,对志书的收藏利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浙江图书馆一直很重视地方志的收集,长期以来,借助省市县各级图书馆系统收藏了大量镇村志,存有新修浙江镇村志约300部。各市县图书馆也有一定的存量,但多寡有别。方志系统近年来逐渐重视,存本有所增加。虽然如此,有的志稿现在只能见到存目,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方志机构,都没有收藏;有的私修志书,只有作者和村委各有存本,甚至不少街道乡镇组织编纂的志书,公共机构中都无法找到。收藏不足,电子化程度不高,必然造成用志的局限性,影响志书价值的发挥。

### 三 编修价值

乡镇志是记载县以下相应基层区划综合情况的志书,是地方志书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乡镇志作为较小区域单位的方志,许多具体内容州府志乘所未备,有拾遗补阙的作用;有的一再纂辑,延续数百年,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更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与学科价值,在中国方志史上有其一席之地。乡镇旧志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认可和发挥,新修镇村志的价值则正在显现和等待发掘,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更为重要和全面的体现。

镇村志编修意义重大,价值无限,已有学人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我们就不再面面俱到,而是取其文献价值作一简要关注,并略及其社会价值和文本价值。

#### (一) 文献价值

毋庸置疑,方志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来源和立论基础,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在编纂者们扎实勤勉的工作下,浙江省建国后编修的大部分镇村志内容丰富,史料充沛。其中保存的文献资料,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社会经济、民俗文化、地方学术等各方面研究的重要材料。

1. 各类研究的重要材料。社会经济研究。中国地域辽阔,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经济发展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想研究某一地具体的社会经济史,就不可避免的要到当地的地方志

<sup>①</sup> 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约30位方志办工作者担任了50余部镇村志的主编。其中,王志邦(曾任职于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俞尚曦(桐乡市地方志办公室)、毛东武(江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均主编了多部镇村志。

书中去寻找相关的史料。因此,乡镇旧志对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革故鼎新,社会巨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相比旧志,新修的各类地方志对于社会经济情况的记载本就更为重视,镇村志也不例外,并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现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保存了大量的史料。“经济”“社会”是常设篇目,工业、农业、商业、金融等经济内容,社区服务、社会治理、计划生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社会内容,在镇村志中多有体现。在镇村志中,相关资料的收集也较为全面和细致。改革开放中的经济改革、经济建设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镇村志书记载的重点,大经济与细资料在镇村志中的结合,使这一历史时段内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好的记录,改革成效得到很好的彰显。有的镇村志中设有“社区志”“人物志”。它们不但记录了昔日的农村如何发展为城市、昔日的农民如何变身为市民的过程,而且向读者展示,昔日的集体经济如何孕育出一批在今日市场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如何培育出一批叱咤风云的创业者、实干家。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创业史入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表现,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

民俗文化研究。民俗文化,是民族和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风尚服饰、饮食文化、社会生活、婚丧嫁娶、舟车行止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地方志就中有许多这方面的细致又琐碎的记载,乡镇志书对风俗的记载则往往比其他史书中更为详细和具体。乡镇旧志中,就载有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礼仪民俗,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也有传统农业社会中与12个月份相关的岁时民俗。新修镇村志对民俗文化的记述更加重视,在篇目设置上几乎没有缺漏“风俗”或“民俗”的,内容也占较大的比例。“尤以一乡习俗,琐细之事,民风礼俗之变易,由此可鉴。”<sup>①</sup>浙江镇村志中蕴含的大量地方风俗,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涉及到许多底层人们的生活,对当地民俗文化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同时也是江南地区风俗的缩影,能为中国民俗文化史的研究提供地域性的案例。

地方史志研究。镇村志包含的地方志内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并常常成为研究的线索,有益于方志发展史的研究。许多志书中整理和保存了当地的历代修志情况,如《塘栖镇志》收录历代修志简况;《新市镇新志》“文献卷”中收录历代修志情况、历代志书内容提要、历代志书序跋文;《南浔文献新志》(2000年4月内部印发)有历代镇志编纂附录;《双林镇志》有双林历代及当代镇志一览表,收录自明万历《双林笔记》起的16部镇志,等等。此外,我们通过温岭《新河镇志》(中华书局2016年)记录的内容,得知前有清代贡生沈文露撰《新河志》2卷(已佚)、1991年西门梁绍文撰《新河镇志参考稿》,按这个线索,增补了清代浙江乡镇志已佚志书一部、当代浙江乡镇志稿一部。

镇村志对于地方史研究亦是重要的资料。《笕桥镇志》“建置志”把该地的社会史追溯到良渚文化时期,贯通古今;“民俗志”“文体志”记载关于防风氏传说和纪念活动,对杭州史前史的研究有重大价值。清代著名学者李富孙,其事迹除见于《清史稿》卷482、《清史列传》卷69之外,还可以在光绪《梅里志》卷10、宣统《梅里备志》卷4找到其传记,这样就能补足正史传记中的不足。地方志记载有时候比正史文献记载更加的翔实,有的甚至还能校正其他文献的错误之处。浙江镇村新志中,不仅在人物篇章下对当地名人搜罗颇全,介绍颇细,还在《艺文》类目下,为了彰显本地的文教成果,突出本地的文教氛围,往往收集了本地学者的大量诗文和著

<sup>①</sup> 吴藕汀:《南浔小志·序》,赞张和孚1966年所编《南浔小志》“续周氏以清末为断,数十年来,陵谷沧桑,可以见其梗概,尤以一乡习俗,琐细之事,民风礼俗之变易,由此可鉴……”。转引自朱从亮纂辑、朱仰高校勘:《南浔文南新志》,2000年,第319页。

作。通过对这一块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充实对学者的认识，补充其完整的图书目录，这样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研究时，才会更加的全面具体。尤其是研究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学术活动、学术著述、学术思想，这些资料，除了在人物的自传，作品集中进行收集和整理，地方志也是研究学术人物、学术著作所不可忽视的资料。

2. 基层社会的生动缩影。浙江镇村新志多数统贯古今，穿越时空，记述今日繁华的悠远历史。如笕桥镇本是以农耕为主业的近效镇，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迅速城市化。清代诗人屠倬所描写的笕桥农村春冬的景象——“荷锄有黄发，采桑多绿鬓”，“田树余桑柘，村居半药笼”，如今已经看不见了。但是镇志的编撰者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忠实记录的笕桥镇农耕文化，不仅见于“土地志”“农业志”“土物志”“民俗志”，还散见于“社区志”“人口志”。这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给寻根的新一代笕桥人和海内外赤子提供了线索和帮助。<sup>①</sup> 兰溪《女埠镇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重视基本地情，用重笔记述社会、人文部类。对政区、山水、土地、居民、氏族、风俗等立专卷作过细的记述。其中专设氏族卷，使全镇55个主要氏族之源流、迁徙、构成、聚落、族规、宗祠、家谱、家训等得以存。临海《杜桥志》除卷前彩页之外，还于卷末设置了“历史留影”，收录各类老照片194帧，生动地展示各时期人民的生活，很是珍贵。而大多数镇村志都记录该镇村老百姓的吃穿住行娱，用文字、图片、表格等，展示出基层社会的原貌。恰如《绍兴县志》主编傅振照在《柯桥区村志丛书·总序》中所说，村志有四个特点：“一是最接地气。它是府（市）、县、镇（乡）志的基础，是地理地名、山水名胜、方物名产、民俗风情的源头。二是最有人气。这一个村庄、数个聚落，一个姓氏、数户人家，祖祖辈辈，薪火相传，都清楚明白。因事出本地，原原本本，故人人关心。三是最聚文气。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桥一路，往往有一个典故，或一种传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翔实可信。四是极富生气。本地人写本地事，记古代，如数家珍，犹如历历在目；记现代，桩桩件件，都觉鲜活如生；记眼前，暗露自信，充满前瞻性。”<sup>②</sup>

## （二）社会价值

数量众多的乡镇志，为留住乡土记忆、接续传统文脉创造了一个新的平台，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参考与文化动力，获得普遍认同并越来越受到重视。

1. 记录经验教训以资借鉴。“理解昨天是把握今天的一把钥匙，昨天的经验和教训是避免今天重蹈覆辙的最好借鉴。”<sup>③</sup> 历史发展道路曲折，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做历史记录，以资后人借鉴。

浙江镇村志不仅翔实地记录历史，更着重记录当代现实；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们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史实，同时又如实记录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由于“左”的干扰，所走过的一条曲折而艰辛的道路。有的镇村志专设“文化大革命”章节，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描述了阶级斗争宽泛化的现象；有的镇村志对人民公社期间的农业经营、工分制度、粮食分配、社会生活等做了全面记述，对大办集体食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现的问题做了如实记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镇村志书突出记述了改革、开放、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详细过程。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偏差、环境污染等各种问题也没有回避，而是基于确凿的历史事实，通过详尽的统计资料，记录于志书之中。

如今，对镇村悠久的历史很多人并不深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历，不仅年轻人

<sup>①</sup> 参见毛昭晰：《笕桥镇志·序》，中华书局，2016年。

<sup>②</sup> 傅振照：《柯桥区村志丛书·总序》，《杨家桥村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104年。

<sup>③</sup>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有所不知，就是年长者也遂渐淡忘。然而，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是一部十分难得又无法替代的生活教科书。有学者这样说，镇村志最有价值、最应当引起编撰工作者和一般学者重视的优点就在于：它充分记录该村所取得的成绩之时，没有忽略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问题。<sup>①</sup> 在2019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文章《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这个规律，就来源于实践与总结。因此，一部部纵贯古今，明古详今，内容充实，体例完善的镇村志问世，其价值和意义是长效的，是无法估量的。<sup>②</sup>

2. 发掘经济人文价值服务社会。镇村志的丰富内容，不仅是学者探索研究的宝库，而且有着能够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实用价值。

如位于松阳和遂昌交界处的界首村，依山傍水，偎依在松阴溪北岸，呈腰带形状。村中保存着一条完整的古驿道，以驿道为主线，两边坐落着驿站、祠堂、学堂、民居、禹王宫、圆拱门、牌坊等明清古建筑群。界首村2006年被省政府批准为第三批省级历史文化村，当年村民自发，并由县志办洪关旺主编18万字《界首村志》。这是松阳县第一部村志，在界首村的日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村两委依据村志记载，对村庄进行整体规划和开发，保护并恢复古驿道和明清古建筑群，保留了古村落的历史格局和传统风貌，美化了环境，带动了旅游，增加了村民收益。2013年6月界首村被列入第二批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14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又如嘉兴《余新镇志》中对“源大”米行史料的记载，帮助“源大”成功申请为浙江省老字号。“源大”米行创于1941年，其第三代传人赵建祥根据余新镇政府编纂的《余新镇志》有关“源大”米行的详细记载（如书中记载的“源大”米行老板就是他的爷爷赵泉有），请镇政府出具有关“源大”米行的资料档案。这张档案证明为“源大”成功申请“浙江老字号”提供有力支撑，起到了重要作用。意识到志书价值后，这家老字号还主动开展“源大”史志的编写。<sup>③</sup> 在《余新镇志》记载的“建国初期余新镇商铺139家”中，“源大”是第一家恢复经营并成功申报“浙江老字号”的品牌。今后，或许会有更多的品牌从志书中走出来、活起来，创造出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培养地情专家培育爱乡情怀。镇村志的编修对于培养地情专家、激发爱乡情怀也有着积极作用。通过镇村志编修，集聚了一批熟悉和了解乡镇村情况的基层工作者，对于他们尽快熟悉地方情况，理清当地的历史脉络，制定出今后的发展规划，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修志中培养出来的存真求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亦将有益于参编者从事地情研究和其他工作。

在镇村志编修过程中，大量乡民参与其中，接受采访，提供资料，给予资助；有不少村志收录每一位村民姓名、家族的变迁情况，甚至为每家每户拍摄留影或留下话语，村民被一一书写于志书之中。编修的过程与成志的结果，让更多关注“小家”的乡民融入到“大家”之中，充分感受到家乡发展，爱乡之情油然而生，强烈的参与感与自豪感激励着他们更加关心镇村集体的发展，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之中。所以，金普森在《南岸村志·序》中说：“小志记载的资料，较之在志来说，更具体、翔实，更亲切、感人，在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方面更具激励作用，甚至超越大志。”<sup>④</sup>

① 参见孙达人：《论族谱——村志的当代意义》，见东阳市象塘村志编纂委员会编《象塘村志》，2000年，第5页。

② 参见魏桥：《横河镇志·序》，横河镇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2007年。

③ 参见《“源大”成功申请浙江省老字号》，2014年10月8日，<http://zj.people.com.cn/n/2014/1008/c186941-22529533.html>，2019年8月6日。

④ 俞日霞主编：《南岸村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 （三）文本价值

方志的文献属性与文献价值，一直得到充分肯定。但在近年的研究中，“文献”经常被当作“文本”来看待，地方志亦作为“文本”被研究者所关注。若将镇村志作为文本看待，仅考察其序跋，就可以看到志书文本价值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镇村志文本表现的方志学发展与争鸣。前文提及，有许多学者为浙江镇村志书作序。作为文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志书这些序跋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学术思想，其中关于志书质量、编纂方法、志书价值等问题的讨论，可以考察到方志学发展状况与学者之间的理念争鸣。

关于乡镇志的编修规模。严济慈曾在《浙江省名镇志·序》中称：“有此一编足可抵百部之乡镇志也。此亦为编纂新方志之一创举，以免乡乡镇镇修志，徒费人力物力。”<sup>①</sup>魏桥在《武义柳城镇志·序》中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镇志，现在并不要求普遍编修，应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sup>②</sup>葛剑雄在《笕桥镇志·序》中指出：“新编乡镇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待增加和提高。”<sup>③</sup>陈桥驿则在《盛陵村志·序》中明确提出：“从比较长远的要求来说，每一个市县除了市县志的修纂以外，还应该做到镇镇有志，村村有志。”<sup>④</sup>可以看到，对于乡镇志书总体规模的把握，有不同的意见在志书中呈现，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 and 志书价值的展现，而逐步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正如钱永兴在《溪里方村志·序》中所说，改革开放解决了村志编修的思想和观念问题，一轮修志为村志编修提供了舆论和理论支持，而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村民经济收入增加则为村志的编修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一轮修志以后大批村志的编修出版，正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sup>⑤</sup>

关于现有志书的编修质量。有很多学者在镇村志中对志书质量进行了客观评价和原因分析。如傅振伦在《新登镇志·跋》中从整体到篇章细致地分析了志书优点与不足，实际上也是对他心目中的佳志作出了期待。李志庭在《浦沿镇志·序》中指出了该志的特点，对有些志书随意采用资料提出批评，对佳作提出了基本要求，一是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二是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陈桥驿在《枫桥史志·序》中称，“修志当然以官修为主，但私修也值得提倡”，并指出官修志书存在机构臃肿、人员冗杂、专家参与少等弊端，呼吁让更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者参与到志书编纂中来，以提升志书质量，减少无益消耗。<sup>⑥</sup>葛剑雄在《笕桥镇志·序》中对新编乡镇志的质量不佳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并分析了主要原因。他说：“真正内容丰富，质量上乘而又能传世的乡镇志还是少数。一方面，本乡镇的人才毕竟有限，本乡镇的人才中愿意并能够踏踏实实为本地编志书的人更少。另一方面，编成的志书未必能出版，也未必能引起外界的重视，能够流传至今的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所有的乡镇政府都能重视，也并非所有的乡镇都能找到称职的主编和编纂人员，因而新编乡镇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待增加和提高。”<sup>⑦</sup>

关于志书的范本问题。在志书的序与评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评析志书的优点之后，给出此志“堪称典范”，可以作为“范本”的评价，作为一种赞赏，也是一种期待。但也有人认为村志“永远不会有什么‘样板’或‘范本’，没有情况相同的村，也决不会有具体内容类

① 浙江省名镇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名镇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② 柳城镇志编纂办公室编：《武义柳城镇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 笕桥镇志编纂委员会编：《笕桥镇志》，中华书局，2016年。

④ 盛陵村志编纂委员会编：《盛陵村志》，中华书局，2009年。

⑤ 参见溪里方村志编纂委员会编：《溪里方村志》（内部印刷），2009年。

⑥ 参见陈炳荣编著：《枫桥史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

⑦ 笕桥镇志编纂委员会编：《笕桥镇志》，中华书局，2016年。

似的村志”<sup>①</sup>。后者的观点看似标新立异，实则二者并未针锋相对，而是各有所指。前者鼓励志书努力提升志质量，达到一定的规范，后者则鼓励志书努力提升特色，反对“千志一面”的照搬照抄。

2. 镇村志文本展现的主观建构与客观反映。有学者认为，各种地方文献既是地方历史的记录，又是地方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固然是区域社会经济变动和地方势力升降的客观反映，同时，它的内容、形式及其出台、流传的过程本身就有主观建构与叙述的成分。<sup>②</sup>

体现主创思想。“文本化”的志书包含着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志书的主创（团队）各有其修志宗旨、编纂思想，在志书中以不同的篇目设置、内容安排来体现，渗透于志书的每一个角落。如镇村志对历次运动的记录，详略差距很大；叙述时所采用的语言方式，也有着明显差异。这与编纂者的亲身经历和沉重回忆密切相关，也与全社会对于历史反思的认识密切相关。对同一历史时期给予详略不同记述，是编纂者的主观建构在志书文本中的客观反映，也体现出不同编纂层级<sup>③</sup>对修志内容的掌控和影响。

即便如志书资料的来源这样的小细节，也有着不同的诠释方式。镇村志资料来源广泛，一般志书仅于凡例中简要说明，主要来源档案、史志、谱牒、口碑、调查等，但具体源于何处却不得而知。浙江乡镇志自萧山《瓜沥镇志》（1986年内部印刷）开始，有具体信息的参考资料列于志末，至2018年共有10余部采用此例，还有少量志书在内文中引用资料时直接注出来源。这些志书在出书时间、所属地域、出版形式等方面并无明显规律，因此大致可以知道，参考资料设置与否、注释到何种程度，主要是依据志书主编或编修团队对资料来源价值的判断。

引导修志观念。志书所具备的历史文本属性施加给人们的影响力是长远而深入的。以村志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村域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村域经济的发展，唤醒村民们的村域价值意识和文化意识。关注本土经验，重视乡土民生，弘扬村域文化，成为村官和村民的共同追求。村志，作为村域文化重要、典型的载体，自然受到青睐和重视。于是村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一个村不但要有家谱和宗谱，以载述一家一族的历史，而且还要有村志，以载述一村的全史。<sup>④</sup>一种观念在一个群体中仅用短短数十年就培育初成，是很不容易的，足见村志与社会发展、人们需求的高度契合。通过大量的修志活动、志书的传播和内容的引导，村志或许能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表达方式，长久地伴随着村庄发展，根深蒂固于村民的思想之中。文本展示出强大而绵长的力量，不容小觑。

##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浙江的镇村志编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今不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影响力，镇村志都是一种相当有份量的志书品类和文化产品。我们作抛砖引玉之谈，期待今后有更多学者对镇村志进行深入的整理、分析和研究，为镇村志编纂提供有益参考，让镇村志在乡村建设、文明传承中更好地发挥出应有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吴世春：《何麻车村志·序》，何麻车村志编纂委员会编，《何麻车村志》1998年。

② 参见谢宏维：《文本与权力：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

③ 除了纯粹私修的志书以外，很多志书有着多层级的编纂组织。如编纂领导小组、编纂委员会、编纂单位、编纂室，等等，它们对志书形式和内容有着不同程度掌控和影响。

④ 参见钱永兴：《溪里方村志·序》，溪里方村志编纂委员编，《溪里方村志》，2009年。